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

毛泽东协商民主理念的时代价值

姚俭建

毛泽东协商民主理念的形成

作为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开创者，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战友们尽管没有直接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概念，但基于丰富的革命和建设新中国的实践初步建构起了协商民主的理论体系框架。毛泽东的协商民主理念正是这一理论体系框架的主干部分。

在协商民主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倾注了大量心血，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既有理论层面的建构创新、制度层面顶层设计，又有实践上的探索变革和方法上的总结提炼。

从理论建构的源头上考察，毛泽东关于协商民主的理念，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民主的本质就是“实现多数人民代替少数人民主”。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本质观，明确提出了人民民主的理念。他认为，中国革命的首要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制度”。不仅如此，在探索多党合作的进程中，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统一战线理论、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顺利召开。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代表充分发扬民主，协商建国大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从顶层设计层面使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种实现形式。1954年，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有了人大还需要不需要民主党派和政协的议论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1956年，他还提出了加强同社会各界进行协商的主张，强调“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这就为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依据，从而在制度、体制和机制层面确定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大重要形式。

毛泽东协商民主理念的内核与层次结构

人民民主是毛泽东协商民主理念的内核。他始终认为，实现人民民主才能使中国共产党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在总结回顾人民政协发展历程中提出了“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精辟论断。这实际体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协商民主及其广泛多层次的独到思考。在层次结构上，主要体现在党群协商、党际协商和党内民主等层面。

首先，人民民主理念在群众工作中的现实体现就是党群协商民主。走群众路线，与群众商量办事，是毛泽东协商民主理念的核心内容。1961年5月14日，毛泽东致信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明确提出：“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做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做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错误。”在毛泽东看来，民主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方法。如毛泽东把群众路线的协商形式转化为基本的领导方法，“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其次，协商合作是毛泽东协商民主理念的基本取向。毛泽东认为，政党关系是最重要的政治关系。他从解决“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入手，探讨党际协商民主的制度形式。早在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就宣示“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因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

由此，毛泽东明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从而正确处理了党与非党关系，为党际协商民主奠定了基础。平等是党际协商民主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强调协商主体平等，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要尊重协商对象，并对一些干部对民主人士傲慢无礼、无视群众意见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平等，就要尊重协商对象，广开言路，虚心倾听不同意见。毛泽东说：“共产党人普求良策执政为民，就‘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1949年，当毛泽东主持“国旗”方案的讨论时，本来他已经对另一种方案有了一定的倾向，但是，当听到张治中的意见后，又重新组织讨论，集集群智共识，最终确定了“五星红旗”方案。

第三，党内民主对党群协商、党际协商等形式的协商工作起到引领、示范作用。毛泽东曾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打铁还需自身硬。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在此前提下，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党内民主能够促进包括党群协商、党际协商等民主政治在内的全国各项工作的积极发展。

毛泽东协商民主理念在新时代的展

毛泽东协商民主理念在新时代的展

在新时代，继承毛泽东协商民主理念这笔丰厚的历史遗产，对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协商民主理念，进一步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在理论上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等重大理念，并且在实践中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进而形成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体系。这主要体现在：

一是民主理念上的发展突破。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概念。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党的二十大首次作出“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重大理论判断，并强调“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实现“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些新理念，丰富发展了民主理论和民主形式。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丰富了民主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渠道、加深了民主的内涵。”

二是目标取向上的纵深强化。围绕协商民主的价值取向、人民民主和群众路线，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能够实行和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这些重要论述成为新时代深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根本遵循。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已经成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包括党际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等形式在内的社会各协商主体之间通过平等的公共协商方式参与决策、达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和制度形式。

三是实践操作上的开拓创新。面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在党的领导下，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正在以守正创新精神，深入拓展协商民主的形式，健全各种制度化协商平台，拓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渠道，着力构建多层次、全方位协商格局。当前，我国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更需要我们不断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进一步完善协商民主制度与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系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统一战线事业的伟大开拓者，创造性地解决了统一战线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汇聚起磅礴力量，形成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15年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毛泽东讲过的三句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所谓政治，就是把我们的手搞得更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统战工作是最大的工作。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从这三句话里提炼出一个深刻道理：“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具有的历久弥新的时代意义。

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统一战线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毛泽东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大问题，以许多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原创性贡献。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学说。毛泽东最早领悟并阐释其真谛。早在青年时期他就提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1922年7月党的二大提出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后，他率先提出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1923年6月党的三大决定实行国共合作，他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确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解决了建立统一战线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基本问题；阐明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可以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主要依靠力量。这些重要观点标志着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初步形成，并贯穿于此后统一战线实践的全过程。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学说创造性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成果。我们可以通过中国统一战线与苏联模式的两点比较来说明。

一是中国的统一战线是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而不是效仿苏维埃模式的狭小的统一战线。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曾以苏联苏维埃为样板建立起“工农苏维埃”政权。由此建立的统一战线是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毛泽东称之为“缩小的统一战线”或“狭小的统一战线”，也就是说“统一战线不够广”。他主张建立的统一战线是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广大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者的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同一切可以联合的非劳动者的联盟，是建立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更广泛的联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中国就与苏联不同。”苏联革命采取直接剥夺的形式，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但中国情况和苏联不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总的说来，基本上是做了好事，有益于国计民生。”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团结改造的政策，采取赎买的办法，经过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将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地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巨大成功，显示出统一战线方法比起苏联直接剥夺方法对发展中国更有效管用。

二是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而不是苏联的一党制。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基于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认识，提出中国实行与苏联一党制不同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式政党制度。针对“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他明确答复：“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他的这一思想，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保留民主党派，以示同苏联的一党制相区别。他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中国实行多党合作制有利于避免苏联一党制缺乏监督的弊端。“我们不但需要工人、农民广大群众监督，而且需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来监督，避免苏联因为没有监督而犯了许多错误，长期不得纠正。”他确定了后来使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概念的基本内涵。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就加强和改进统战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科学回答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性质、任务、范围、对象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对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丰富和发展，续写了对马克思主义原创性贡献的新篇章。

提出同中国文化深相结合，为统一战线奠定深厚的哲学文化根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1943年5月他主持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提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

深相结合起来。”

毛泽东最早将统一战线称之为“法宝”，而“法宝”则是中国古代文化独有的词汇，是指克敌制胜的有力武器。1939年7月他向陕北公学讲话，引用《封神榜》的故事比喻说：“今天你们也要下山了，要去前线跟日本侵略者作战，我也赠你们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团结。”随后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正式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的三大法宝的根。

毛泽东为统一战线奠定了唯物辩证法哲学基础，其中就包括中国古代辩证法。他在《矛盾论》中用东汉史学家班固的“相反皆相成也”来说明：“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依据这一基本观点，他提出：“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后来将其发展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也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方法。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统一战线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哲学理念。毛泽东以这一理念来处理统一战线的重大关系问题。如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磨擦问题，他指出：“这个统一战线的名词里已经包含着磨擦的意思，因为讲统一，起码是两个以上才有可能，如果只有一个，‘孤掌难鸣’，就不会有磨擦，但一有两个，两个手掌就拍得响了，磨擦就难免的。统一战线有一万年，磨擦也有一万年，有统一战线就有磨擦，因为有不同，所以有磨擦，不过我们是尽一切力量使磨擦减少。”如统一战线不能搞“清一色”，他指出：“真理不在乎是不是清一色。”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明确要求：“加强思想政治引领，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一致性是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一致，多样性是利益多元、思想多样的反映，要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不要搞成‘清一色’。”

提出建立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统一战线，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主题，也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主题。早在1925年10月，毛泽东就提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使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最早的表达。他认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什么？毫无疑问，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他提出“国家复兴”概念：“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灾难：“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中国共产党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倡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展望，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一旦宣告成功，就有权高呼：“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有一天在地球上站起来，雄壮地站起来，高举着民族革命最后胜利的旗帜。”中华民族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这种精神，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再来一次伟大的证明。”

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认为，没有全国胜利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提出建立“一个极其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开明绅士、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即全中国人民大众。依靠这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伟大飞跃。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庄严宣告：“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重视发挥统一战线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作用。在私营工商业改造过程中，他提出：建立统一战线“对现在在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也是有好处的。因此，统一战线要坚持下去”。我们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他希望：“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们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承担这个职责。”1956年11月他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设想：“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零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

具有历久弥新的时代意义

张峰

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明确要求完善大统战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提出人心就是力量，强调统一战线争取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作用。“人心就是力量”，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精髓。毛泽东之所以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看重的是统一战线能够为党和国家事业提供人心和力量支持的强大作用。

政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夺取政权单靠武装斗争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人心，这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人心所向决定了人民解放军的战争具有的爱国主义的革命的性质的，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是真正的优势：“优势在民主力量方面，不是在反动力量方面。反动派的金钱和枪炮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优势，人心讨厌反动派，不赞成反动派，人们团结起来反对反动派，并和反动派作斗争，这个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的事实证明，人民解放军之所以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败国民党八百万军队，正是由于得到了全国人民真心实意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争取人心，靠的就是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认为，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就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他批评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错误口号，纠正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左”的错误，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政权形成了巩固的阶级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仍然重视发挥统一战线争取人心的重要作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源原因，他认为：“是人心之所向，是人们的思想。”“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依靠统一战线实现了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形成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局面，齐心协力克服各种困难，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艰巨复杂的任务。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统一战线凝聚人心的作用。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他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从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高度深刻揭示了守住人民的心的重大意义，为新时代做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

（作者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北京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教授）